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理性与自由

[印]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 著

李风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02

4

2006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理性与自由

[印]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

李风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与自由/[印] 阿马蒂亚·森著; 李风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ISBN 7-300-07446-4

I. 理…

II. ①森…②李…

III. 经济学: 哲学-研究

IV. F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2422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理性与自由

[印] 阿马蒂亚·森 著

李风华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62511239	(出版部)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44 插页 2	定 价	58.00 元
字 数	730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策 划

马学亮

主 编

陈志俊 何 帆 周业安

编委会

丁 利	王永钦	王忠玉	刘元春	李军林	李辉文	朱 勇
陆 铭	陈利平	陈 钊	陈志俊	陈彦斌	何 帆	张晓晶
周业安	郑江淮	杨其静	柯荣柱	贾毓玲	夏业良	寇宗来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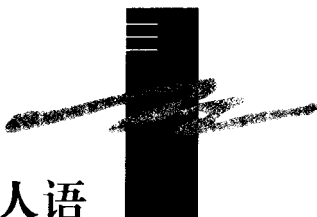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译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

经济学到了 20 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 20 世纪，经济学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不断地深耕密植。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日益精细完美。经济学家们还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主干之上发展出了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等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学的范式，细致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这正是经济学能够以加速度迅猛发展的原因。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仑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然而，21世纪悄然降临。经济学工匠向窗外望去，发现在更高的山冈上，已经矗立起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殿的脚手架。我们的选择在于：是继续在20世纪的经济学殿堂里雕梁画栋，还是到21世纪经济学的工地上添砖加瓦。

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21世纪的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讲到，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21世纪的经济学将从纸上谈兵转变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现象。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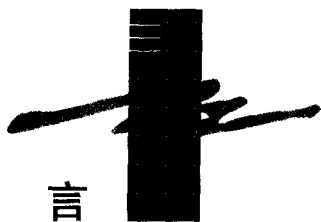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所翻译的主要是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20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如果不惮“以偏概全”的指责，我们可以大致举出21世纪经济学的若干演进方向：博弈论将几乎全面地改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日益动态化；政治经济分析尝试用经济学的逻辑对复杂的政策决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平等、道德等伦理学的讨论也将重新进入经济学。

介绍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踪国外经济学的前沿。追赶者易于蜕变成追随者，盲目的追随易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经济学是济世之学，它必将回归于现实。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并不是出于赶趟的豪言或是追星的时髦。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世纪之交，经济学

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这恰恰契合了中国的当前境况。我们借鉴的不仅仅是别人已经成型的理论，我们想要从中体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活跃和开放。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留学海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套译丛的推荐、翻译工作，这套译丛的选题是开放式的，我们真诚地欢迎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关注这套丛书的同时，能给予它更多的支持，把优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推荐给我们。

序 言



“理性”和“自由”属于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确实，这些领域中许多重要主题都有赖于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解釋。人们常常运用这两个概念，却很少仔细审查，因此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地探讨是很有必要的。这本论文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对这个相当程度上受到忽视的任务做出一些小小贡献。

1991年，我在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讲座上对“自由与社会选择”进行了分析，理性与自由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分析中占据关键地位。讲稿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后，收入本书，作为最后的三篇论文。本书中许多篇章讨论了理性的条件，它们来自于我在1987年在赫尔辛基的Yrjö Jahnsson讲座。

本书是关于“理性、自由和正义”的两卷本论文集中的第一本，它集中讨论理性和自由

的概念以及对于个人和社会选择的含义。其姊妹篇《自由与正义》则致力于探讨正义在一般情况下的实际推理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推理。在讨论正义时，理性和自由将得到充分的运用，比如说，对政治和道德哲学以及公共政策的探讨。因此，虽然第一卷主要关注经济学和社会选择，而第二卷主要关注哲学和政治，但两者存在贯通的纽带。

在这两卷书中，论文所安排的顺序并未根据它们实际发展的时间（其中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论文）。它反映的是分析上的优先性以及内在脉络，而不是时间先后。

这些年来，我与许多朋友、同事和合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过许多使我获益良多的讨论和争辩。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不一，涵盖社会选择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数学、决策论、社会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领域。我将仅仅列举他们中部分人的名字，因为无法全部指陈所有那些激发我思想兴趣，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问题的人名。我对所有人都心存感激。

我对理性和自由的理解受到了几十年来我与肯尼思·阿罗相互讨论的强烈影响。本书最后收录了经过修订之后的肯尼思·阿罗讲稿，这是我欠他的浓重恩情的一个微小表示。多年来，我与萨德尔·阿南德（Sudhir Anand）、A. B. 阿特金森（A. B. Atkinson）、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吉恩·德热兹（Jean Drèze）、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彼得·哈蒙德（Peter Hammond）、艾萨克·莱维（Isaac Levi）、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马撒·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萨迪克·奥斯马尼（Siddiq Osmani）、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艾玛·罗斯希德（Emma Rothschild）、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铃村小太郎（Kotaro Suzumura）、薇薇安·沃尔什（Vivian Walsh）、斯特凡诺·扎马格尼（Stefano Zamagni）等人在这些问题上有过讨论，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帮助。

在哲学方面，我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所受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姊妹篇《自由与正义》一书所收的论文尤其明显。我在哈佛大学的11年（1987—1998年）中，我获得了许多与哲学系其他同事交往的机会，其中包括罗伯特·诺齐克〔几乎每年我都要和他共同开一门课，有时还加上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他的观念和批评有助于我厘清自己的思想）和托马斯·斯坎

伦 (Thomas Scanlon, 我从他的深刻分析和尖锐评论中获益匪浅)]。去哈佛之前的十年时间 (1977—1987 年), 我有幸与罗纳德·德沃金、德里克·帕菲特、G. A. 柯亨 (G. A. Cohen) 在牛津大学共同执教, 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得益不少。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与巴纳德·威廉姆斯 (Barnard Williams) 合作撰写关于功利主义的著作以来, 我就常常从他那里寻求思想和洞察力的源泉, 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此外, 我还从多年来与阿克·比尔格拉米 (Akeel Bilgrami)、约书亚·柯亨 (Joshua Cohen)、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苏珊·赫尔利 (Susan Hurley)、艾萨克·莱维 (Isaak Levi)、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奥诺拉·奥尼尔 (Onora O’Neil)、约翰·希利 (John Searle)、拉里·泰姆金 (Larry Temkin)、菲利普·范帕赖斯 (Philippe Van Parijs) 以及其他人的讨论中获得了许多教益。

在社会选择领域, 我与许多同事有过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这里所呈献的论文尤其受与保罗·阿南德 (Paul Anand)、尼克·贝根特 (Nick Baigent)、查尔斯·布莱克贝 (Charles Blackorby)、拉雅·德布 (Rajat Deb)、巴斯卡尔·杜塔 (Bhaskar Dutta)、罗伯特·波拉克 (Robert Polak) 和铃村小太郎 (他还阅读了本书的引言并给予了极其有用的评论) 等人的讨论的影响。在经济学方面, 我从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A. B. 阿特金森、考希克·巴苏、安格斯·德亚顿 (Angus Deaton)、杰瑞·格林 (Jerry Green)、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拉维·坎伯尔 (Ravi Kanbur)、刘民权 (Minquan Liu)、埃斯凡迪亚尔·马索尼 (Esfandiar Maasoumi)、穆库尔·马加姆达 (Mukul Majumdar)、斯蒂芬·马格林 (Stephen Marglin)、盖伊·米克斯 (Gay Meeks)、詹姆斯·莫里斯 (James Mirrlees)、马姆达·默西 (Mamta Murthi)、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 North)、萨迪克·奥斯马尼、E. S. 费尔普斯 (E. S. Phelps)、马修·拉宾 (Matthew Rabin)、V. K. 拉马坎德兰 (V. K. Rammachandran)、卡尔·里斯金 (Carl Riskin)、约翰·罗默尔 (John Roemer)、维维安·沃尔什、梅纳汉·亚里 (Menahem Yaari) 以及其他人的评论中学到许多。还有许多人影响我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 其中相当一部人单独在篇章中给予说明。此外, 我应当指出, 这些论文中的思想都曾以某种形式在我所任教的各大学里传达给我的学生, 而我在与他们的互动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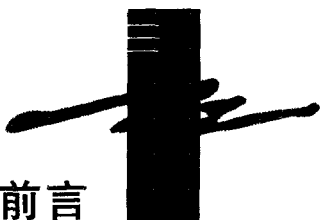
最后, 我诚挚地感激瓦伦蒂娜·乌尔巴内克 (Valentina Urbanek)



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极其便利的支持以及亚历克斯·古弗里特 (Alex Gourevitch)、罗赞·弗林 (Rosanne Flynn)、罗西·沃恩 (Rosie Vaughan) 和阿伦·亚伯拉罕 (Arun Abraham) 极其出色的帮助。对上述所有提到的人，谨此表达谢意和感激。

2002 年 5 月

译者前言



阿马蒂亚·森在许多学术领域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森的著述引发了哲学、经济学的多次著名讨论，如贫困指数问题、增长模型问题、他与哈萨尼关于社会福利函数应如何考虑分配问题的争论、自由悖论问题、福利主义问题、评价相对性问题。这些在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上出现的多次争论以森作为中心，本身就足以说明森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地位。

不过，由于森的兴趣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很难判断他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之所在。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森更多地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对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道德关注。许多专业的经济学家在介绍森时，也特别强调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如萨克

斯在向《纽约时报》撰稿时称他最基本的主题是“甚至极其贫穷的国家也能够提高其最贫苦人民的福利”。而森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非常专业且精深的造诣似乎被他在贫困与饥荒等现实问题方面的成就所掩盖了。但是，从学术以及思想的角度来看，一般理论方面的贡献也许具有更为久远的价值。而且，考虑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基本根据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良心，而是其学术上的成就，那么，森在社会选择理论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就更应值得我们重视。

森在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是这样概括他本人的学术贡献的（见本书第 2 章）：“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我凭以获奖的研究领域是‘福利经济学’，它包括三个分支领域：社会选择、分配和贫困。我确实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过这些主题，但是只有社会选择理论……才为对各种社会可能性的评价和选择（其中尤其包括社会福利、不平等和贫困的估价）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在这一颁奖典礼上，我有充足的理由集中讨论社会选择理论。”

社会选择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社会评价与选择程序的设计。它所追问的问题是：如何将个人偏好（preference）加总成社会选择。如果所有人的个人偏好都完全一致，那么就不存在这个偏好加总的问题。但现实往往是人们的偏好各异，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决策机制，从而以一种比较满意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选择。探讨如何寻求最合理的社会选择程序的理论就是社会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对于森来说，主要是一种学术工具，一种方法。他运用社会选择的方法，对许多实质性问题也提出了影响广泛的深识遽见。这些洞见，除了贫困、饥荒、妇女不平等社会层面问题之上的研究，还体现在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森也许算不上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绝对是 20 世纪后半叶政治哲学发展中所不可或缺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的“自由悖论”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与争鸣，而在权利与自由的几次大讨论中，也往往见到他的身影。翻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人名索引，我们会发现森被引证的次数达 16 次之多，仅仅次于康德和西季威克，在同时代作家中无人可比。而在当代社会契约论最重要的作家肯·宾莫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一书中，除了宾莫尔本人之外，引用最多的个人的文献篇目就数森的著述，达 10 篇之多。考虑到罗尔斯和宾莫尔对于政治哲学的意义，森对于政治哲学的贡献确实值得我们重视。

本卷书收录了森近 20 年以来有关理性与自由等政治哲学、福利经济

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问题的论文。它们可以说是森多年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贡献的荟萃，也是我们理解森并从而把握当代社会选择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最好窗口。

二

理性堪称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的基本走向。从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的讨论来看，主流的观点将理性都视为一种经济理性。但是这种主流的观点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相接近而又彼此相区别的定義。森从中拈出被广泛运用的三种定义，对它们做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它们分别是：“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观、“自利最大化”观以及“一般最大化”观。

内在一致性的理性观与萨缪尔逊等人创立的“显示偏好”理论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对于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注重的是在不同情况下各种选择之间的关联，它将选择结果与不同的“菜单”（也就是不同的可以利用的备选方案集）进行比较，而无须任何外在的参数（目标、价值、偏好）。森认为，内在一致性既不能成为理性的充分条件，也不能成为理性的必要条件。因为若不考虑到选择者的动机，“一致性”的内涵根本就无法确定。而一旦考虑到动机关联，就一定会涉及一个“外在”的参数（外在于选择行为本身），这时一致性条件就不再是纯粹的选择的“内在”一致性。

与内在一致性的理性观不同，自利最大化与一般最大化将理性与选择外的某个参数联系起来，因此并不存在内在一致性主张所遇到的逻辑悖谬。最大化观，尤其是自利最大化，最常见的假设就是“经济人”的假设，现在已经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和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森认为，这种观点仍然存在深刻的局限性。对此，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说明。人们的许多行为都显然符合合作的要求，而为了解释这种行为，这种观点不得不加入各种附加的结构以及特殊的假设，比如克雷普斯的声誉模型就将“囚徒困境”改造成一种重复博弈。森认为，这种解释过于迂回，不应成为理性行为理论的核心。而且重复博弈的运行有一个条件，就是减少参与人的共同知识。森认为，这完全误解了社会中的合作。森的方案是将“囚徒困境”改造成确信博弈，而这里强调的是参与人的共同知识，在这里，伦理、道德和规范政治的因素又得以引入理性行为的解释之中。

第三种观点即理性的一般最大化，它要比自利最大化有着更广泛的应

用范围，因为在这个最大化框架之内人们可以具有不同类型的目标和价值，比如利他主义或社会利益最大化，而且它还要求系统推理和审查后的选择。相比较前面的自利最大化，这种观点确实比较宽泛。在社会选择理论中，这种观点比较常见。森指出，这种主流的观点的概括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作出修正：第一，最大化可以要求不完备性，而且可以考虑过程因素。第二，不确定性问题，如“非对称信息”问题。它本身并不要求任何对最大化个人所知信息的背离。虽然将选择建立在一个人所实际拥有的信息的做法是明智的，但理性也要求合理的努力是扩展个人的知识，尤其当个人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时候。这样就涉及其他问题，其中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事先预知将获得多少信息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性，以及在决策的紧迫性和迅速有效获知信息的限度的情况下，采用某种或其他版本的“有限理性”的可行性。第三，最大化行为充其量不过是理性的必要条件，并且很难说是它的充分条件。理性不仅用于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的集合，而且也用于审查这些目标和价值本身。根据有待最大化的内容，最大化行为有时会愚蠢无比，并缺乏理性的估价。理性绝不可仅仅只是一种追求某些既定的——并未经审查的——目标和价值集合的工具性条件。

森深刻批评了这些观点，但并不把它们一概排斥，而是认为有必要认清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同时将它们加以扩展，提出一种更为完备充分的理性观。森认为，人的自我具有四个特征。通常的理论主要关注它的前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1）“自我中心的福利”，（2）“自我福利的目标”，（3）“自我目标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自我最重要的是具有自我合理审查的能力。前面这三种，许多理论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纳入其理性的定义中，而森强调的是第四个，即合理审查（reasoned scrutiny）。

所谓合理审查主要指个人对其本人的目标、价值观、偏好等具有一种自主的评价与审查的能力。个人具有这种能力，他可以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他有理由追求的生活。否则，如果没有目标之类的审查，那么理性就完全成为一种工具，并不能够真正指导我们的生活。设想一个人，他正在用一把钝刀砍他的脚趾头。我们问他何以如此鲁莽，他回答到，去掉其脚趾确实是他的目标，因为这样他“感觉不错”。“你是否考虑过”，我们追问到，“如果没有了脚趾，其后果会怎么样？”他回答道：“没有，我还没考虑过，我也不打算考虑这一问题，因为去掉脚趾正是我所希望的；它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认识到，我是完全理性的，因为我明智而有系统地追求

我的目标”（本书第1章）。显然，在这里，该人并未真正运用其合理审查的能力。

在森看来，人不仅是能够享受其消费、体验并预期其福利、拥有目标的实体，而且也是一个能够审查其价值和目标，并根据这些价值和目标进行选择实体。合理审查并不必然要求人们时时刻刻按照道德伦理要求去行事，但是合理审查存在就会为道德和伦理影响人们行为打开通途。人们也许会为道德关怀和社会理由所动，也许并不为它所动，但人们从未被禁止去思考这些问题，形塑他们的价值观，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去修正他们的目标和行为。

三

森将自由摆在了极端重要的地位上。他认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自由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而且也因为它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标准。当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的利弊或者某种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否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不同类型的自由及其它们在社会中的实现与剥夺。在这个问题上，森实现了对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最关键的决裂，因为传统福利经济学仅仅局限于福利或者说效用之上，而森将自由这个概念引入了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

自由的探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对它们的定义相当多，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许多政治哲学家都是从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切入这一分析的。而森主张从自由的机会方面与过程方面入手来探讨。其中机会方面与传统的福利比较接近，主要指“追求我们之所以重视并有理由重视的事物的机会”（第20章）。过程方面则指我们的目标实现的过程。自由的这两个方面彼此相关，在评价时往往相互影响，不同的学者对于自由的定义往往各有偏重。比如，库普曼斯与克雷普斯将自由的意义解释为满足未来不可知兴趣的灵活性，这显然是自由的机会层面的内容。相比之下，罗伯特·诺齐克（1973，1974）则更关注自由程序的正当性方面，而这显然与相关社会选择程序的恰当性存在密切关联。总体上，当经济学家运用自由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们所侧重的是自由所提供的机会。相比较而言，政治哲学中“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则取决于过程和程序的含义。

森认为，对过程的考虑并不能与对机会的评价完全割裂开来。比如说，我们所追求的机会并不仅仅是达到某种“顶点”，而且也包括某种特